

财政部长和他孩子们

中国青年报记者 凌燕麦

一些时候来，青年中常常流传这样的话：“不靠数理化，就靠好爸爸。”这的确反映了我们目前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实际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提倡的，什么是我们应该反对的。我们青年应该向谁学习，向谁看齐呢？为此，记者采访了财政部长吴波同志。

严于律己 不搞特殊

在财政部采访的几天时间里，从司机、秘书、行政管理人员到司局长、副部长，大家从不同的角度，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向我介绍了吴波同志的事迹，都异口同声地赞扬。

“吴老工作一贯兢兢业业，认真负责。”

“吴老平易近人，艰苦朴素，严于律己，不搞特殊。”

“吴老是我们的好部长啊！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！”

吴波同志今年七十四岁，一九四一年就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任秘书长，建国后担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、副部长、部长，四十年来一直做财政工作，是一位刻苦学习、精通业务的领导干部。他的职务几经提升，当了部长，仍住在五十年代初住的一个小四合院里，现在门窗的油漆斑斑剥落，墙壁已经十七年没有粉刷。唐山地震以后，墙壁两处出现裂缝，机关和房管所要给他修理，他执意不肯，还诙谐地说，“我研究过了，即使墙壁倒塌，也是往外倒，不会有危险的。”他还说：“我是财政部长，管钱的，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，许多人居住条

件都很差，我的房子能住就行了，应当先给别人修。”

吴老当了部长，行政处的同志准备给他配备新的沙发、大办公桌、电扇等家具。他知道后，就找行政处的同志说：“我家里的东西一切照旧，什么也不要给我。需要什么东西，我可以自己解决，你们要多关心下面的同志……”行政处的同志觉得吴老家的沙发实在太旧，提出要修理，换个沙发套，也被拒绝了。现在，吴老家里的沙发套还是他爱人邸力同志（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）自己买布缝制的。

当了部长，照例可配备“红旗”轿车，可是吴老不讲这一套。他说：“车，只要能跑就行了。为什么职务一变，待遇也一定要变呢？”吴老用车一贯公私分明，从不坐公车逛公园、上百货商店。即使因公外出开会，如果路程比较短，他总是坚持步行，从不用车。有时和老战友来往，需要派车送一下，就要司机记上帐扣钱。他对家里人要求也很严，从来不让家里人使用公家的车。一次，小孙女生病发高烧，司机小孙对吴老说：“让我开车送她上一次医院吧！”吴老却严肃地说：“不能给小孩惯这毛病。”

三年困难时期，吴老也不要特殊照顾，把发给他的“供应卡”锁在柜子里。秘书发现后，心疼地对吴老说：“你夜以继日地工作，年纪又大，应该注意一些营养，否则你身体吃不消。”可是，我们的吴老却毫不在意地说：“现在国家有困难，大家都有困难，作为领导干部，只有同大家同甘共苦，才能不脱离群众。”一九五九年夏天，吴老到北京郊区芦沟桥公社一个

大队参加劳动一个月，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生活。社员都亲切地叫他“吴老头儿”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

“路要靠自己走 不能依靠父母”

吴老搞财政工作几十年，到处都有老战友，老下级，可是他从未想到要利用职权和战友关系，把自己的儿子弄到身边，或调到大城市，安排如意的工作岗位。吴老常说：“权力是人民给我们的，我们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私利。”“孩子从学校毕业，就是国家的人，要服从祖国分配。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青年人尤其要注意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。”他还经常对儿子们说：“路要靠自己走，不能依靠父母。靠父母不能长久，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。”在吴老的教育和鼓励下，他四个儿子有三个在外地工作，而且都是在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。大儿子初中毕业后，响应党的号召，报名参加支援大西北建设。吴老高兴地对他说：“我支持你的行动，青年人志在四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。可你一定要记住，既决定去，就不能中途当逃兵，要在那里安家落户。”就这样，大儿子离开了北京，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舟曲县工作一直到现在。二儿子原在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，一九六六年，响应党的号召，自愿报名支援了三线建设，并且把爱人、小孩和岳母一起迁去。吴老对此积极支持。至今，他一家仍生活、工作在陕西省铜川的一个山沟沟里。四儿子一九五七年从部队转业，自愿报名到北大荒参加建设，在那里结了婚，安了家。

吴老还要求儿子们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，注意艰苦朴素，不准搞特殊。大儿子从小在安徽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，后来，回到父母身边，在北京一〇一中学住读。家里每月给他二十元生活费。他除了伙食费外，还经常攒下一些钱来添置衣服或鞋袜。三儿子虽然和吴老住在一起，但是在生活上也是自力更生，不依靠父母，不搞特殊。

吴老经常提醒儿子，不能由于父母所处的地位而觉得自己特殊，更不能利用父母的权力谋私利。在外地的三个儿子，多少年来都一直安心工作，没有哪一个向父亲提出过调动工作的要求。

不搞门当户对 和群众心连心

吴老一家和劳动人民心心相连。在吴老的教育影响下，他的儿子们也没有那种高干子弟的特殊感、优越感。几个儿子找对象，也不考虑自己的门第。说起儿子们的婚事时，吴老打趣地说：“我们没有搞门当户对，对象都是他们自己找的，几个儿媳妇都是劳动人民和一般干部的子女。”

大儿媳在甘肃省舟曲县饭店当服务员，工作积极肯干，被评为县和自治州的先进工作者，四儿媳早年因病在农场退职，现在家属队当临时工。二儿媳的母亲是保姆，在去陕西以前，吴老多次叫亲家母来玩，但有一段时间她怕部长家里看不起她，不好意思来。吴老和他的爱人知道这情况后，对二儿媳说：“你告诉妈妈，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，我们是亲戚，要老人来吧。”以后老人们才有了来往。

吴老职务虽高，却始终关心群众，把劳动人民看作是自己的亲人。吴老家的保姆，全家都称呼她孙奶奶。有时，孙奶奶的亲戚来看望她，吴老总是留他们一起吃饭。每到夏天，孙奶奶住的房子西晒。窗上除了挂苇帘外，吴老和邱力同志亲自在孙奶奶窗前种上扁豆和牵牛花，以遮阳光。孙奶奶对我说：“吴部长不讲吃穿，没有一点架子。我在他家里做活，象在自己家里一样。”文化大革命前给吴老开车的司机老蔡，至今仍和吴老住在一个院里，相处十几年，他深有感慨地说：“吴老虽然是个‘大官’，但平常对人总是很客气。我家中人口多，生活有困难，吴老一家给我们的帮助很多。从一九六四年到现在，我们一家六口人的水电费，月月都是由吴老替我交的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吴

(下转第16页)

公仆的遗憾

编者按：这一期我们转载了《人民日报》一篇短文“公仆的遗憾”和《中国青年报》一篇通讯“财政部长和他的孩子们”。前一篇说的是张劲夫同志路遇病人，急人之难，让车相救的事迹。后一篇说的是吴波同志一贯严于律己、艰苦朴素，平易近人，不搞特殊的事迹。恰好张劲夫同志也曾经是财政部长，这就为我们广大财政干部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。张劲夫同志表示：“遗憾的是，还有许多该做的事未做，或者未有做好”。吴波同志表示：“同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来衡量自己，我还做得很不够呢！”古语说：坐而议，不如起而行，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让我们以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标准，以劲夫、吴波同志为榜样，在人民公仆这个光荣的岗位上，把该做而未做或未做好的事，把做得还不够的事，进一步做好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吧！

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、省长张劲夫同志在下乡途中，见到有人摔伤于地，不是冷眼一看，扬长而去，而是急人之难，让车相救。这虽是一件小事，却被群众传为美谈。尤其发人深思的，是他在读罢当事人的感谢信后写下的话：“不要感谢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遗憾的是，还有许多该做的事未做，或者未有做好。”

这是一位公仆感到的遗憾。一个人，只有具备了强烈的革命责任感，才能时时感应到人民对他的召唤，处处看得到需要他去尽心尽力的事情。尽管他们不断做着有益于人民的事，却从不认为自己做得差不多了。相反，常常有

一种遗憾的心情。正因为他们总是以做得少为憾，才有可能做得更多、更好。

在生活中也有另外一种人。他们在其位而不谋其政，渎职而不知自责。少的是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，多的是逍遥为“官”的本事。他们或许也会感到遗憾的，那不是因为自己贡献于人民的太少，而是觉得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不够。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“遗憾”的心情，他究竟是真公仆还是假公仆，就很值得研究了。

晨 平

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1980年6月17日）

（上接第18页）

老不坐车，那时，我上下班都是走着到机关，想买辆自行车，经济上有困难。吴老知道后，主动给我钱。我才买了一辆自行车。”吴老对机关职工的困难很关心。六十年代初给吴老开过车的老李同志，现在年纪大、行动不便，老伴又有病。吴老夫妇和儿子有时去探望并送钱给

他。

吴老是非常谦虚的。一次，在他家里，当我表示要向吴老学习时，他说：“我是搞财政工作的，对自己检点一些是应该的。用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来衡量自己，我还做得很不够呢！”

（转载1980年6月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